

裴文中院士传略

高星



裴文中，男，1904年1月19日出生于河北省丰南县，1982年9月18日逝世于北京。他是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发现者，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发掘与研究的重要组织者，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中国史前考古学、古人类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的主要创始人。他曾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该所古人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自然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国际史前与原史学联合会名誉常务理事、国际第四纪联合会名誉会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裴文中一生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著述等身，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文学创作、博物馆建设和社会活动诸多方面皆成就斐然，令人叹服。

彷徨中的探索

裴文中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中国的动荡和战乱中度过的。国与家的贫穷和时局的混乱促使裴文中在痛苦中思索，在彷徨中探求，并勇敢地去实践自己的诉求。据载，11岁时，在开平高等小学读书的他便在父亲的鼓励下在街头和庙会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卖国行径。1919年少年

裴文中在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在北平学生“五四”爱国热浪的熏染下，他热心投入运动，积极声援北平学生，作为班代表参加校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并参与发起“护国会”、“演讲团”等组织。

1921年裴文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家境贫寒的他不得不半工半读，兼职小学教师，在报社作校对，替别人整理稿件，间或从事文学创作，将小说、杂文向报刊投寄，以赚取稿费，补充学费。在因需而写的创作中，裴文中逐渐萌生了浓厚的文学创作欲望并展现出才华。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山海关战火交织，裴文中将对亲人的担忧和国家的忧患之情写入小说《戎马声》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篇小说得到鲁迅的欣赏，在《中国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把裴文中称为“乡土文学”之一种，称赞其文风“信手写来，不事雕琢”。在此期间裴文中还发表过一篇散文，名为《走过W学校的门口》，表达反帝反列强的决心，后被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中国现代散文选·第2卷》中。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在《晨报》上发表署名“革命”的三字长歌，宣传反英反日。这首长歌曾印成传单，被游行队伍在全市散发。

裴文中对地质学本无多大的兴趣。在国破家亡的危机面前，他与许多有志青年一样以拯救国家、振兴民族为己任，“有志于办党办报”，并满腔热忱投入其中。1926年他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京大学地下党小组的活动。其后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裴文中与组织失掉联系，又在彷徨中开始新的探索。

周口店的惊世发现

1928年春在翁文灏的安排下，裴文中赴周口店，帮助发掘主持人杨钟健

做后勤管理工作。勤奋好学的他在龙骨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科学探索活动。他先是主动参加发掘，成为辨认化石能手；翌年春接手主持周口店发掘，于1929年12月2日亲手发掘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举世轰动。因为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进化论在人类演化中得以印证，在此之前发现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也得以回归人类的大家庭之中。

发现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的轰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埋没了裴文中在周口店的其他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实际上北京猿人的头三具头盖骨都是裴文中发现的。1929年他在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并采集用火遗迹，这是周口店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裴文中又从第1地点出土物和地层中辨识出石制品。石器的发现和确认虽不及猿人头盖骨那样引人注目，但却有了偶然的成分，其过程更加曲折，科学的探索和原创精神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当时学术界对史前人类技术和开发原料能力的认识还十分粗浅，在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大量采用石英做工具的先例在世界上极为罕见。在裴文中提出周口店洞穴中这些锋利的石英片是中国猿人的工具并遭到当时学术权威的质疑时，他独辟蹊径，采用模拟实验，对人工打击和使用所产生的疤痕同自然破损痕迹进行显微观察与比较，使得一项重大发现得到科学的论证，并最终被权威认可。在对周口店石英制品的实验和观察中，裴文中发现了当时人类开发该种石料的独特方法，并命名为“砸击技术”。裴文中这些开创性的工作使周口店由一处古脊椎动物化石地点跃升为一处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古人类和考古遗址，成为人类演化的圣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

考古方法的改革和创新

挖”方法，以将动物化石和其他遗物挖掘出土为目的。裴文中在工作中感到该方法过于粗陋，许多科学信息未被收集。1932年他主导了周口店发掘的第一次改革，借鉴了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方式。次年在发掘山顶洞时对发掘和记录方法又进行更细、更深入的改革，创建了当时考古发掘中最规范、最细致的规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遵循和效法。他还亲自设计了一些简单的机械，实现了发掘运输的“机械化”。

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裴文中铺垫的。最初该学科的基本方法是由德日进、步日耶等法国学者传入，但这些基于西欧石器标本的类型学和形态学方法在周口店陷入困境。为了证实与中国猿人伴生的痕迹不清楚、形态不规则的石英石片是古人类的制品，裴文中进行了几方面的尝试：其一，石器制作实验，以此观察人工石英制品的形态特征，并从中发现了有效开发石英原料的砸击技术；其二，采集自然碎石与地层出土标本进行对比，以此观察自然和人工者的区别；其三，通过对破裂面的光泽、破损和断口形态以及裂纹、波纹等特征的显微观察，确立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区别标准。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触摸到现代流行的以模拟石器的制作与使用为核心的实验考古学和以解析石器功能为宗旨的使用痕迹分析的根系，裴文中也以此方面的开拓和成就在这些分支学科的发展史上确立了初吃螃蟹者的地位，受到西方学术界的推崇。

1935年裴文中赴法国巴黎留学。在从事博士论文研究期间，他将石器的制作实验和人工与非人工标本的对比观察进一步推向系统和成熟。他对打片方法的实验观察包括了硬锤法和软锤法；对修整方法则涉及到了“打击修整”和“压力修整”。裴文中此项研究最精彩的部分是对非人工破碎而又易于与人工石制品相混淆的碎石的观察研究，所涉及的自然营力包括温度作用、地层的挤压错动、树木根系的挤压作用、水流搬运作用、冰川作用、海洋作用、风蚀

作用、车辆碾压作用、机器“造假”、动物践踏的破碎作用等。裴文中所观察和实验的项目非常全面，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石器与非石器之区别》一文是一部石器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裴文中对考古遗址出土的碎骨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所观察的项目包括啮齿类和食肉类的咬痕、抓痕、化学腐蚀、水的作用、机械作用等，并结合考古标本列举了一些易于误判的例证，例如化石上的自然穿孔、假铭文或假雕刻、机械作用产生的假骨器等。基于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中国猿人的骨器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由原来受步日耶影响认同碎骨中有骨器而转为更加慎重的态度，并谆谆教诲：“在确认骨化石上的史前人类加工痕迹之前，一定要非常谨慎”。

埋藏学和古人类生存环境研究的先驱

裴文中上述对碎石、碎骨的成因和环境研究成为后起于西方的考古埋藏学的核心内容。事实上裴老在周口店早期的发掘时对遗物的分布和埋藏情况给予了更全面的关注。在发掘鸽子堂石英 II 层时，他注意到存在动物化石种类失衡现象，据此推测是古人类猎食所致。他根据出土的骨骼多具有新鲜的破裂边缘的现象推测这些骨骼在形成后未经历长时间的风化作用，很快得以埋藏。对于山顶洞遗址的若干现象，他也从埋藏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根据人骨化石上的赤铁矿粉和装饰品的分布位置，以及人骨的出土状态，判断其为一处墓葬，并指出墓葬形成后发生过动物的扰动和坍塌石块的破坏作用。可以看出他在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中已经涉及到考古遗存的形成过程和后天各种营力对遗址的改造作用，并通过动物碎骨的种类比例、破碎状况、风化和磨蚀程度等推断遗址的性质和埋藏条件，并提取古人类的行为信息。故而称他为埋藏学的先驱是当之无愧的。

裴文中很早就在旧石器考古研究中关注环境对古人类生存和文化的影响。在研究周口店第15地点时，他根据动物群中一些有气候环境标志的种属对当时周口店及其周围的生态环境做这样的推测：以草原生态为主色调，一些山坡被森林覆盖，而在高地或坡脚则间或分布着沙漠条带。当首次尝试将中国的古人类遗存与欧洲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时，他更是依赖于环境方面的资料以弥补中西文化间缺乏可比性的不足，将动物群组分、冰期与间冰期更替、黄土堆积和地文期侵蚀与堆积韵律等多项环境指标引入古环境研究，以此为中国人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寻求与欧洲遗存的对应关系，建立起中国的古人类演化和古文化发展序列。如此多方位研究古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考古学文化与环境的耦合关系，裴老不但在中国是第一人，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也是执牛耳者。

----- 开创中国第四纪地层学和哺乳动物学 -----

裴文中是我国第四纪地层学和哺乳动物学的重要开拓者。20世纪30年代初他独自发表了两部有关周口店哺乳动物化石的专著——《周口店第五地点的哺乳动物遗存》和《周口店第一地点的食肉类》，并与杨钟健、德日进等合作发表了若干相关的论文和专著。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裴文中逐渐成为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生物地层学研究的主要代表。在这一期间他发表了3部有关周口店哺乳动物的专著，近10篇有关周口店及华南地层和哺乳类化石的论文。1955—1963年裴文中多次组织考察队，对广西洞穴堆积中的巨猿动物群进行调查和发掘，采集了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包括巨猿下颌骨3件和1000多颗牙齿。其中哺乳动物化石成了裴文中在此后年代中主要的研究对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有些文章直到他逝世后才得以发表。

裴文中首次提出了第四纪哺乳动物地理分布中“淮河过渡区”的概念。

他在 1957—1963 年间连续发表数篇论文，将中国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分布划分为华北、华南、淮河和东北四个区。这成为中国第四纪动物地理分布的基本概念之一，为后来从事第四纪研究的学者所普遍接受。裴文中还提出了一个“小—大—小”的“裴氏定律”。在生物学中大家普遍认同的是博格曼定律，即体型大小和气候有关（简化说，寒冷气候中体型变大），而在古生物学领域则是德帕锐（Deperet C.）的“古生物体型增大定律”，即“在每一个古生物的分支中，都是以小的体型开始，以后体型逐渐增大，最后达到最大的体型。一种古生物达到最大体型的阶段，这一分支就绝灭了”。裴文中于 1963 年和 1965 年发表了《关于第四纪哺乳动物体型变化的问题》和《关于第四纪哺乳动物体型增大和缩小问题的初步讨论》两篇文章，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和北美、欧洲、广西巨猿洞及其他洞穴哺乳动物的情况对博格曼定律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指出博格曼定律对一些脊椎动物是适用的，但不是绝对的。他列举了大熊猫、獐、豺以及巨猿的例子，说明在更新世初期和中期都有体型增大和减小的种类，同一种动物在第四纪不同时期也有体型大小的区别。他将德帕锐的定律修正为：古生物的一个种或一个小分支不是在达到最大体型阶段后绝灭，而是在达到最大体型后体型又缩小，在体型缩小阶段中绝灭。这样的研究结论，在当时是富有创新性的，至今仍有重要的影响力。

架设中国史前考古文化体系框架

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文化体系的雏形是裴文中确立的。在此之前，桑志华、德日进在甘肃庆阳、宁夏水洞沟、内蒙萨拉乌苏等遗址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制品，中国旧石器遗存开始在一个单一时间平面上呈现横向的点状分布。1932 年裴文中与德日进合作发表《周口店中国猿人堆积层的石工业》，在周口

第1地点建立起A、B、C三个文化带，中国旧石器文化纵向体系的第一块基石得以铺垫。其后周口店第13、15地点和山顶洞被发现、发掘和研究，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序列的时代框架被拉开和伸张了。以后更随着元谋、小长梁、蓝田、丁村、大荔、观音洞、许家窑、峙峪、小南海等一系列遗址的发现，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日渐丰满、日趋完整。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也是裴文中建立起来的。在1937年发表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文中，他将步日耶所报道的来自泥河湾的一件石制品和周口店第13地点的石器遗存作为“最早的人工制作的迹象”，将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早段”，将周口店第15地点称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将“河套文化”定位为“旧石器时代中期”，而将山顶洞文化界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1948年裴文中进一步排出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早期的顺序是周口店第13地点→第1地点→第15地点，中期以包括水洞沟和萨拉乌苏的“河套文化”为代表，晚期为山顶洞。在发表于1965年的《中国的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一文中，他将中国猿人文化、蓝田猿人文化和匭河文化作为中国旧石器早期的代表，将丁村文化作为旧石器中期的代表，而将萨拉乌苏、水洞沟、山顶洞遗存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并增加了以“沙苑文化”为代表的“可能的中石器时代”。这样的分期方案以后虽有微调，但基本框架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

中国的“中石器时代”的概念是裴文中首先提出来的。1935年他在广西武鸣和桂林近郊的4个洞穴中发现大批的打制石器和少量磨制石器，无陶片共出，伴生的动物遗存皆为现生种。他据此提出它们是“中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中石器时代”的概念当时只在欧洲提出过，流传不很广，裴文中将其应用到中国的遗存，反映了他广博的知识面和勤于思考的精神。1943年他在内蒙古扎赉诺尔调查试掘，认为该遗址的“扎赉期”和黑龙江顾乡屯遗址的

文化遗存属中石器时代。但以后他根据新材料和新情况改变了对中国“中石器时代”遗存的一些看法。1965年他指出：“在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并不发达。……目前仅有在陕西大荔县发现的‘沙苑文化’，或许属于中国中石器时代，不过它依然有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可能性”。应该说对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问题”，裴文中当年提出了一个富有自我挑战、自我否定精神的命题，而直至今日我国的史前考古学界仍然在为破解这道命题，在为中国有无“中石器时代”和以什么样的标准界定“中石器时代”而争论不休。

裴文中在中国最早关注细石器研究问题。40年代末他在甘肃和青海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时即采集过细石器标本并加以报道和描述。其后他开始致力于细石器遗存的综合分析，提出“细石器文化”的概念，并主张从西伯利亚到欧洲的细石器文化是连接为一体的，在较晚的时候在长城附近与仰韶文化相接触，形成混合文化。在当时的材料基础上，他将中国的细石器遗存划分为“扎赉”、“龙江”、“林西”和“赤峰”4期，分别相当于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并认为中国细石器文化是由北向南发展的。这样的分期如今已不被采用，但从这里可以看出裴老是将细石器遗存作为一个文化和技术体系来看待的，而不认为它代表一个考古学时代或人类技术的特定发展阶段。裴文中对中国细石器源流的研究为后来诸多学者所继承，影响深远。

裴文中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拓荒者之一，尤其在西北地区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1933年他曾参与调查河南浞池仰韶村遗址。1947年7—10月他在甘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在渭河上游、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以及黄河沿岸的兰州附近做过3个多月的调查和试掘，发现遗址93处。1948年6—8月他又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做过3个月的考察。这些考察都是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的。当时西北一片乱象，到处是兵勇、流寇，裴文中不得不用地质调查所“授予”的“少将”军衔和偶然结识的地方“老大”

的字条为其考察铺路，为标本的运行开道。这些考察的收获是巨大的，他首次记述了该地区的石灰居住面；从陶器类型和地理障碍等方面论证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不科学之处；对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分布、分期和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修正了过去的一些学术观点，突破了安特生的“六期”体系；命名了“齐家文化”和“沙井文化”。这些发现和研究为建立西北地区的史前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成为日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强劲发展的良好开端。

从20世纪40年代起裴老便在总结旧石器时代、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致力于建立中国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体系和远古文化发展史。他的宏篇巨著《史前考古学概论》一稿，包括绪论、欧洲和中国的史前文化，长达30余万言。令人痛惜的是，该手稿在新中国成立前佚散，仅绪论部分得以保存，后被收录在《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中，篇名为“史前考古学基础”。在此之后，他根据当时的社会理论和考古材料，将人类的“原始社会”划分为4个时期：（1）自然群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和中期；（2）“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中石器时代；（3）“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4）“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相当于铜器时代。从中可以看到裴文中具有广阔的视野，注重用考古学的材料来研究重大的社会问题，没有被器物的形态和类型变异束缚住手脚。虽然这样普适性的社会演化阶段的划分不再成为学术时尚，但他的作法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史前研究处于旧石器时代考古与新石器时代考古相割裂的状态，学术研讨很少跨越人为设定的旧、新之间的鸿沟，中华文明的探源也止于这道门槛。这种画地为牢、条块分割局面的形成显然有悖于裴老的初衷，也阻碍了完整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体系的建立。

在陶器类型学研究方面裴老也引领学术之先，有开创之功。他发表于1947

年的《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是我国陶器类型学研究的一篇早期代表性作品。在该文中他首先阐述了三足器的定义、部位名称界定和分类，然后分别讨论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陶鬲与陶鼎的特点和演变趋势。该文涉及到当时中国出土的商周及其前的多个遗址的丰富的材料，配有精美写实的线图，清楚地勾画出两类器物的演化过程。中国考古学历来以地层学和类型学为两大法宝，而裴文中此篇文献无疑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作之一。另外他还著有《中国古代陶器》一稿，望文生义，显然是一部对陶器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可惜已遗失。

博物馆建设与人才培养

早在1940年秋季，裴文中即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史前考古学，在中国首开史前考古教学的先河。1942年他应聘去北京师范大学地质系教书，1945年回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考古学”。1946年他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和中法大学兼职教授，除担任授课任务外还率历史系学生和文科研究所人员调查、发掘北平西郊汉代遗址。

在1952—1955年期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在北大举办了4次考古人员训练班（戏称“黄埔”4期），均以裴文中为班主任。他亲自编写讲义、授课、指导学员田野实习，并承担教学的组织工作，广请当时中国文物考古界和史学界名流为学员讲课。4期训练班共培训336人，为配合全国基本建设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和蓬勃发展的新中国文博考古事业培养了社会急需的基本业务骨干和领导力量，对中国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裴文中还与梁思永、向达共同发起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办工作。1952年11月北大考古教研室成立，裴文中兼任教授，负责石器时代教研

组，主讲史前考古学，并组织各门课程教学小组进行教材讨论。为使北大的考古教学能有一个良好的资料和标本条件，裴文中无私地将自己收藏的有关欧洲旧石器考古方面的书籍和珍贵的洞穴壁画图册放置于历史系，供师生们查阅，并将其历尽艰辛从欧洲带回的石器和原始艺术标本的部分典型者捐献给考古专业，为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标本成为日后建立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旧石器考古标本室的镇室之宝，时至今日仍在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发挥着作用。

为解决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方面专门人才的匮乏问题，在裴文中和贾兰坡的组织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1956年起数度在周口店举办古人类—旧石器考古田野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培训内容包括旧石器考古学、新石器考古学、古人类学、地质学、古脊椎动物学的讲授和田野发掘。这样的培训使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脊椎动物学的第二代研究力量开始成长，尤其为地方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使这些生僻学科研究的触角随着这些敬业者们的东探西考而得以伸展。裴文中还在工作中对刚刚走上研究岗位的青年工作者悉心指教，言传身教督导；并招收研究生，传道授业解惑。他于20世纪50—60年代招收的学生在旧石器考古学、史前考古学、博物馆学、第四纪地层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和古环境学方面皆有专攻，足见其带领新一代学人在各个分支领域开拓进取、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遗憾的是这样的强劲势头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遏制，裴文中的宏愿未能完全实现。

老骥伏枥，精神永存

裴先生不断进取，不断创新，即使在晚年仍锐气不减，奋斗不已。70年代中期，部分恢复学术自由的裴先生在其学生张森水的辅佐下承担了对北京猿

人石器工业的综合研究。面对这一庞杂的材料体系，裴、张二人将定量方法引入研究之中，用大量科学数据展示北京人的石器技术与类型的特点和演变，解决了周口店石器工业的发展变化问题，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规范化和定量研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1980年他东渡日本讲学，根据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出土的动物化石和旧石器遗存的比较研究和古地理变化，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的古交通”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在第四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曾以陆地相连”，“华北与日本的旧石器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在中更新世之末和晚更新世之初，在日本和华北之间没有古代人类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该论点的提出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反响，为区域间的古环境、古文化研究奠定了新的基调。

裴文中是从田野中走出的科学家，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野外考察中度过的。晚年先生因“文革”的摧残体弱多病，有时大小便失禁，但他仍然坚持到野外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亲自验证新的发现。他疲惫的身影出现在河北、内蒙古、贵州……，并留下“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的名言。在逝世前一个月，他还在信中勾画自己的考察路线：9月去柳州，再去杭州，最后到安徽和县。明年去满洲里，去贵州……。1982年9月18日，裴先生带着这样的工作计划和对挚爱事业的眷恋与世长辞。

裴文中是中国20世纪的科学精英，是地质学界、古人类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卓有成就的文学家、科普作家和教育家，同时还是文博界的重要领导者。能同时开辟几个学科领域，并在其他学术天地中引领风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后人很难望其项背。裴文中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不安于现状、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所开展的“知识创新工程”的精髓！